邓小平的破局智慧

□ 沈传亮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成长的烦恼，甚至会遇到较大的困难、挑战或考验。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需要破局智慧。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政治经验，具有高超的破局智慧，值得后人学习。

抓住决定性环节

面对变动不居的形势、深刻复杂的局面，最迫切的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切不可四处出击，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遗留难题堆积成山，同时“两个凡是”的出现又表明历史的惯性十分强大，摆脱起来很有难度，一时中国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如何尽快摆脱这种局面？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必须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思想不解放，什么事都不敢想更不敢干。因而，他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住“两个凡是”不放，从1977年4月给中央写信到1978年5月给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同志明确说“两个凡是”不对；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7月份找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再到9月去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讲，“四处点火”，鼓励各地干部解放思想，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动下、支持下、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顶住压力真正开展了起来，进而形成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结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转移工作重心的累累硕果，一举摆脱困局。抓关键、抓重点，是邓小平破局智慧的鲜明特点。比如他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非常符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定位。

走一走，看一看

坐在房子里面壁，不会得出破局的办法。走到屋外，走进民间，实地考察，问计于民，有助于得出解决难题的思路，有时还能出现豁然开朗的效果 。邓小平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在邓小平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概念后，对于中国能否如期实现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在国内还是有些看法的。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在了解这几个地方实际发展情况后，他的心里有了底。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很大。正是这次浙沪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当时，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发展也遇到了困难，有的人写材料把经济特区与旧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一时特区发展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在此关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对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透过各地热火朝天干事业的场景、震撼人心的口号，看到了发展的大势、看清了主流，欣然为珠海、深圳题了词。2月24日，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了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此，对外开放事业成功破局，迈开大步，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为之一新，也极大带动了内地的发展。

用事实说话

事实最有说服力。有时工作遇到困难，推动不下去，就要用事实来推着人们向前走。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时候改革决策遭遇执行难的问题，也多次遭遇新生事物出现了怎么办的难题。邓小平的办法是“允许看”，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教育人。由各地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引发的农村大变革就曾遇到问题。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观望态度甚至出现抵触心理。怎么办？中央并没有强推，一方面开会研讨，一方面采取了用事实教育干部群众的做法。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重要谈话时就说过，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还谈道“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允许看”的方法论就是让事实说话，让实际来改变人、教育人。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其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个体经济的兴起、市场行为的规模出现等。有的地方对此拿捏不准，政策实施左右为难，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采取“允许看”、让事实说话的方法，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行。

做好自己的事

有时变局的出现、困局的形成，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是和我们有联系的个体出了问题。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是世界大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大变局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使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曲折，还让中国前行经受巨大外部压力。加上国内改革也有10多年，累积的问题、新生的矛盾，层累叠加，中国确实在方向感上存在较大难题。东欧局势刚出现动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抓住解决国际国内互动性问题的要害。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们从容应对了国际变局、化解了国内忧虑，维护了国家利益，也发展了双边多边关系。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叠加互动的新时代，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统筹兼顾

困局或危局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在困局中实现突围，在危局中发现机遇，有时需要瞻前顾后、更需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常常带有统筹兼顾的强烈意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两个大局”再到处理美苏关系等等，都是如此。在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统筹兼顾提出思路。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道，“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邓小平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虑并有节奏推进和苏联关系“正常化”问题期间，非常注意同美国的沟通，关注关照美国的关切。此事自始至终邓小平都亲自参与、亲自决策。正因处理好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把握好了彼此关切，才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红色热土·英雄城市·永载史册

□ 郑永红　吴　翔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深情指出：“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武汉是一方红色热土，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是当时国内外8个重要早期组织之一，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块重要基石。党成立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其影响震动神州大地。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说：“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风雷激荡撼动江城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风暴同时席卷武汉。5月5日，武汉《大公报》《汉口日报》等连续刊登北京游行示威的消息。5月6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和中华大学学生林育南拟出一份宣传单，呼吁有血性的炎黄子孙“不应该忘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事”，走上街头广为散发。与此同时，武汉各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演讲，并成立武昌学生团，向北京学界发电声援，同时开始联络工商各界抵制日货。5月18日下午，3000余名武汉各校学生在阅马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大会，会后，学生们手持“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供国货”等字样的白色小旗开始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众商民莫不现一直喜悦之表示，又莫不含有痛恨日人欺侮之怒气”，纷纷表示不代销日货。

学生的爱国行动终于得到了社会各界响应，武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旗帜鲜明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5月下旬，汉口日资企业泰安纱厂工人罢工。6月5日，汉口英租界平和、荣茂两花厂工人罢工。自7日起，武汉三镇其他部分工厂、行业及外国在华企业工人相继罢工。日资企业工人纷纷离场，不为日商做工。同时，铁路、邮电工人也在酝酿联合罢工，武汉各工厂工人还在酝酿总同盟罢工。以武汉工人为主体的人民斗争给了反动当局以巨大的压力。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群英结党播撒火种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武汉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切实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实践活动。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的来信，获悉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情况。上海党组织要求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在复信中同意立即开始建党活动。此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为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是年六七月间，董必武与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等在武汉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地址在武昌抚院街三号。会议讨论了如何在武汉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重要贡献，逐步形成了由研究会、武汉中学和革命刊物三位一体的坚强阵地，探索出以党领团、党团结合的组织发展途径。1920年3月，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街（现为武昌区粮道街297号）一所简陋的小院创办了武汉中学。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灌输革命思想。在董必武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都有武汉中学毕业生参加。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位领导人中，就有5位毕业于武汉中学。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陈潭秋等经常在研究会报告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体会。为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思想报道，促进武汉人民觉醒，团结武汉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伟大斗争锤炼了革命骨干，到1921年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到9名成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0年11月7日，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成立。在武汉党组织的多方努力下，湖北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工人运动掀起高潮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即开始深入工人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极大提高了武汉工人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全新的局面。

党的一大召开后，董必武、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并迅速成立了先后以包惠僧、林育南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壮阔场景。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随后，英美烟厂、湘鄂印刷厂、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相继罢工，到1922年10月，湖北党组织在武汉先后成立30多个工会，宣布成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一波强劲的武汉工人罢工浪潮席卷而来，其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全国极为少见，并最终引发了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拟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各界代表160余人前往郑州参会。此时，一直标榜“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撕掉了面具，突然下令禁止大会举行，并派出大批军警阻止代表入场。愤怒的参会代表冲破阻挡，进入会场宣布按计划举行会议，庄严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2月4日，汉口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随着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一声令下，江岸机器厂罢工的汽笛长鸣，仅仅几个小时，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名工人相继全体罢工，平日川流不息、往来繁忙的京汉铁路陷入瘫痪，犹如一条巨大僵硬的死蛇，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大恐慌。吴佩孚恼羞成怒，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采取严厉的武力镇压。

面对白色恐怖，武汉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绝不屈服。工人纠察队员以木棍、铁棒与军警展开肉搏，30多名工人牺牲。林祥谦被捕后，被凶残的刽子手连砍3刀，忍着剧痛怒吼：“头可断，工不可复。”最后壮烈就义。面对军警的枪口，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慷慨陈词：“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鬼，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凛然正气，青史永存。以汉口江岸为中心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的顶峰。

新中国初期党如何领导军民反细菌战

□ 李　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及沿海部分地区秘密实施了细菌战，给中朝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最终粉碎了细菌战，在我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学应对疫情的发生与进展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可疑昆虫聚集。此后，又有志愿军部队发现类似情形，可疑昆虫均携带病菌病毒。从2月29日开始，美军飞机频繁在中国东北和山东地区空投大量细菌弹，造成上述地区不同程度地流行传染性疾病。

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并派专家到前线指导防疫工作。2月19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拟定了战区防疫动员、朝中外长发表声明、请苏联帮助等应对细菌战措施。由此，在党中央领导下，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反细菌战工作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发出反细菌战宣传工作指示，中央军委发出防疫工作指示，制定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拟分两阶段实施反细菌战：即准备和预防阶段；如果细菌战事态严重，则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

1952年2月29日，美军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反细菌战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3月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东北及沿海地区反细菌战措施。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反细菌战指示》，指出反细菌战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规定朝鲜为疫区，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各类区域反细菌战的主要任务不同，但都围绕着防疫进行，强调预防与治疗相结合，医学防疫与对敌斗争相结合。

推动战区与国内反细菌战同步进行

建立防疫组织机构，加强对反细菌战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志愿军和国内相继成立了防疫组织，部署和指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防疫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国内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和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等地设立细菌研究中心；东北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

建立健全制度，保证反细菌战工作有序实施。一是疫情报告制度。规定各单位每日报告新疫情，收集美军投撒毒虫的基本信息，毒虫送检化验，及时通报新发现的病毒。二是疫情常规处理制度。疫区人员定期消毒、化验、注射疫苗。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强制注射疫苗，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有疫状时要隔离治疗。三是交通管制制度。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设立防疫检验站；非十分必要的物资暂停运输，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妥为包装；车辆经过疫情严重的地点时禁止停车和装卸。

制定科学防疫措施，保障军民生命安全。在朝鲜前线，部队实行防疫分区负责制，设立“紧急防菌警号”，建立专门的传染病治疗机构，普遍注射疫苗。加强部队卫生建设，修建洗澡堂、灭虱室、隔离室，制定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卫生守约”，训练防疫人员。协助朝鲜居民共同开展防疫，帮助他们清洁卫生，为防疫重点地区居民注射鼠疫疫苗。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防疫专家和防疫人员，提供了足够的传染病疫苗和消毒粉剂。

国内动员与争取国际援助相结合

一是运用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2月22日、24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和中国外长周恩来分别发表声明，历数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诸多事实，谴责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号召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与之斗争到底。为了揭露和控诉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国内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新华社和广播电台采编新闻，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揭露细菌战的真实动机。

二是组织调查细菌战事实，公布美军俘虏供词。为了彻底揭穿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谎言，中国单独组织或接受国际调查团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中国各界代表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各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陆续在朝鲜和中国调查。调查团通过勘查现场、问询人证、探查物证、分析案例，均认为美国对细菌战应该负完全责任。1952年5月6日以来，新华社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人员供词，把细菌战从策划、准备、实施到检验效果的细节公之于众。调查结论和美军供词，使得美国政府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

三是动员民众声讨细菌战，支持志愿军抗美援朝。为了团结和教育各阶层民众，粉碎美军细菌战，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严正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可耻罪行。许多抗战时期日寇细菌工厂附近的居民，以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寇用细菌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声讨美帝国主义走日寇的老路，用细菌病毒杀害中朝人民的罪行，要求严惩细菌战犯。

反细菌战防疫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

反细菌战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经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具有长效机制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对于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而且对于促进新中国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把群众性防疫运动彻底发动起来，中央提出：“不仅取得反细菌战的胜利，而且要取得卫生建设上的胜利”。各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清洁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污水，消灭蚊、蝇、虱、蚤，把防疫扑灭毒虫细菌做到了家喻户晓，“把垃圾当美国鬼子消灭干净”。由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饮食行业卫生都有了显著改进，解决了许多城市多年未解决的环境卫生问题，农村里的景象也是焕然一新，旧社会所造成的迷信思想和肮脏习惯，已逐渐被“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气所代替。